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十一）

1966年一个闷热的夏夜，一位同学上门通知我：火速到校，“今晚有革命行动”。我立即穿上军装，系上腰带，套上红袖标，向学校跑去。

到了学校，才知道这次行动是抄家，抄家对象曾参加过“三青团”（全称“三民主义青年团”）。我跟着队伍，一路小跑，在迷宫似的深巷里，不知拐了多少弯，才到达目的地。

这是南京城南典型的大杂院，前后四五进，每一进的过道两边都放着煤炉，炉边堆满了煤基和杂物，电灯被烟尘熏得油黑，泄出昏暗的光。被抄者住第三进，家中只有老头老太两人。我们首先控制了菜刀、锅铲、煤钎之类铁器，防止他们“疯狂反扑”，报复行凶。两个女生把老太押到天井里，按坐在一只小凳上，然后分立两边，不许她站起来。老头被绑在破藤椅上，由我和另一人看管。还有两人担任警戒，不准闲杂人等靠近。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行动，一开始挺紧张，生怕老头偷偷挣脱绳索，第一个报复我，他稍一动，我就厉声大喝“不许动”。慢慢我发现，老头不像有企图反抗的意思，眼皮耷着，仿佛在打盹，偶尔也抬一下眼皮，看一眼抄家的人。我看他神态平静，无所谓的样子，心想这家伙可能十分阴险，电影上都是这样的。我很气愤，斥道：“老实点，别假装不在乎！”不料他却说：“来过几批了，就算你们顶客气，没摔家伙，你们这批红卫兵好。”老头果然阴险，打我们糖衣炮弹，给我们戴高帽子呢。我当然不吃这一套，喝道：“不许乱说！哪一批红卫兵不好？”老头不作声了。

老头家确实被别人抄过了，地板撬开后还没钉上，天花板捣了两个大窟窿，板壁上的贴纸被撕得有一块无一块。我们的人搜得很仔细，甚至连一堆旧鞋子也逐一掏了一遍。抄家结束，期望中的罪证什么也没找到，最后拎走一小捆旧报纸。

这是我参加过的惟一一次抄家行动。事过30多年，那情景仍清晰如昨。那次行动虽说十分温和，但我一直怀着沉重的负罪感。我常问自己，我们这批曾被喻为“温顺绵羊”的中学生，何以会在转眼之间就变成“狼”了呢？如果说在我们还是“羊”的时候，身体里就有了“狼”的基因，那么，“狼”的基因又是如何潜入我们体内的呢？

□ 原载《南方周末》2000年5月26日

∞ ∞ ∞ ∞ ∞ ∞ ∞ ∞ ∞ ∞

#### 教导主任之死与我

• 周继能 •

1968年3月的一天，我在学校军训团蓝干事的桌面上见到一份《申述书》，是学校教导处庞主任写的，为自己以“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押送回乡提出辩解与要求。该教导主任的这一“身份”，在1966年7月运动之始由“内部掌握”而被公开。

我当时20岁，66届高三毕业，因“史无前例”的到来而留校“革命”。见到这份《申述书》，我立即与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右倾翻案”的论述联系起来，想到了“紧跟”。所谓“紧跟”，就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之谓也。于是纠集了几个“战士”，到教工宿舍及学校的当眼处，刷上了几条“不准翻案”之类的标语，然后煮糖水吃去了。

几天后，竟然传来了庞主任的死讯，他是被“主义兵”打死的。据军训团蓝干事说，头天晚上，“主义兵”把庞主任叫了去，一伙人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见人不成，急忙从墙头拖过去，扔回家里就跑了，庞主任当天晚上就咽了气。

为首打人者郑某，我的同届邻班同学。郑某“根正苗红”，颇得“政治”眷顾：作为在校学生，竟然去当过“四清运动政治学徒”；文革狂飚扫到学校，则荣任“文化革命工作队”队员之职。到了1967年，其母被“揪出”，据称是“叛徒”。郑某就从天上跌到了地下。同在一校的如花似玉的妹妹，竟也因之精神失常。郑某，就是在这种境遇下，为首打人的。

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所在的一所普通中学变成了“绞肉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非正常死亡”的学生有7人，老师有5人。

打人者郑某，下场亦是凄惨。70年代末曾在某国有大公司机关工作，后因此事被揭发，受到了处分，随后患上了不治之症，终年不及四十。

我把这一秘密埋在心底32年，自己也从毛头小子到了望六之人。此事再不提起，将会湮灭在冥冥之中。假如不是我当时的无知，“主义兵”或者不会知道有人在“翻案”，事情有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虽然庞主任很难躲得过随后“清理阶级队伍”，但事情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清夜扪心，深感痛疚，我诅咒自己的过错，诅咒那个年代。愿庞主任在天之灵安息！

□ 原载《南方周末》2000年6月9日

~~~~~

【专题研究】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浅谈57年和66年的大学生（连载之一）

• 漂 木 •

海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化革命的起源，一般从1956年开始。罗·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从“整风反右”探讨。1996年中国大陆唯一出版的文革研究新著《“文化大革命”史稿》，也从八大、整风、反右起论述文革。对于1956—57年和1966—67年的中国政治运动，党史、国史乃至政治学方面，已有不少著述；但对于被卷进这后半世纪中国政治大动荡的知识分子群体，其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多限于文学的反映。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大学生，当时一度成为思想文化动荡的先锋，对他们还缺乏严肃的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不管他们在现代中国思想运动或思想民主化的进程中有何种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留下何种积极或消极的遗产。

麦克法夸尔把57和66大学生联系起来，认为毛泽东“……只是在他对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发展不抱幻想时，他才准备打击党的本身……他用自己在1957年压制的同一部份人——学生来打击先锋”（1）。

这位“旁观者”一语点到两代人的某些微妙联系。

56、57、66、67年，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上有何关联，是一个深刻的课题，而几代知识分子思想不尽相识，断层裂隙比比皆是；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悲剧，却是肯定的。66大学生也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却不幸地、不可避免与中国共产党一起重蹈历史误区。

这些年出版不少描述57年右派血泪、文革文人血泪、知青血泪的书；而60年代大学生的心态历史，仍旧是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只黑匣子，是文人、学者笔墨未及的一片荒野荆棘。从社会现代化的历程视角，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

文化革命也终将回到深刻的带有变革意义的社会运动原点来剖析。改革开放的进程将迫使人们深沉地回眸改革的起源、文革与改革的关系。问题恰在这里，因为66人从总体说趋向变革。这是弄清文革中民众心理及动因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反右史、特别文革史似应进入文化思想史领域进行了。

西方政治文化说之父阿尔蒙德在66年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2）。韦伯则解释为“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这个政治文化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并投影在全社会成员心理上。法兰西有法兰西风格的政治文化，与法兰西人惊人的相似，中国人也特别重视政治和历史，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倾向。在1957年后系统地形成了一种渗透某些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和政治价值观念的极左的政治文化，影响着、制约着甚至决定着中国的政党、政府以及千百万人的心理与行动。只有研究深入到大多数中国人，深入到投身于政治、思想运动的民众，深入到心理—思想—行为及其社会经济背景，才可能真正历史唯物地辨析历史，才可能总结民族的悲剧，也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特别是作为闹剧重演（如马克思所言）。

文化革命中大学生喜欢读列宁在《革命青年的任务》中的一段话，说大学生是一部份最敏感的知识分子，他们与知识分子一样，最有意识、最彻底、最准确地反映表现了社会各个阶级利益和政治派别的发展。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参与意识，历来是浸浴了儒家文化的东方知识分子价值观的一种体现。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使一百年来青年学子的敏感和政治激情，总试图与社会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57、66的大学生状况也基本如此。

#### ◇ 一. 政治文化的情结——关于大学生的“门户”之见

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整风反右与文化革命的那个时代普遍强调学生的家庭出身。由于历史的原因，56、57年大学生中，出身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家庭的是少数，多数学生来自民族资本家、中上层知识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家庭，就是知识分子也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有部份学生的家长和社会关系，的确是建国初各种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在反右中和反右后，舆论偏重宣传敌对阶级的子弟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主席多次讲到这些非无产阶级子弟不可靠；大学生的出身，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剥削阶级家庭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三。北大57年也是群学之首，57年北大学生会赵震江作过一个统计：那时北大“民主广场”的骨干，有75%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出身，有40%的人直系亲属被判死刑，所谓有杀父之仇的；有25%的人因混入党团被清洗，流氓盗窃分子占14%（3）。这个统计，不究其实际性如何，说明当时这样阶级分析，是有主导的普遍政治文化倾向性的。不过，57年右派学生中，也不乏家庭出身与本人出身所谓好的，比如北大学生谭天荣。人大著名学生林希翎，是参军调干生，16岁就参加革命。从各地被打成的学生右派、青年右派看，也有一批原来由共产党一手培养、提拔的骨干，批判他们狂妄自大，极端个人主义……知名的热血干部王蒙、刘宾雁，也许属于这一类。

同时，中共推行的阶级路线也受到有些学生特别是所谓右派学生的怀疑。北大钱如平认为“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而沈迪克对社会主义社会实际存在有等级不满，怀疑是否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有联系（4）。

但是60年代学院学生成份有了很大变化。1966年，调干生已经极少。60、61、62年入大学的学生，对家庭出身没有太强调。60年生源不足，还动员了高二学生升学，61、62贯彻文化科教的一些调整政策，贯彻高教60条，强调考生文化，后来又有“重在表现”之说，所以一般院校，大致是三三制，出身工农革干的，出身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中农）的，出身地富、资本家以及家庭有

政治问题的，各占1/3。这个数字，文革中常常流传。重点院校，特别是北大、清华这类学校，情况有所不同。大致学生父母亲或社会关系处于（或曾处于）社会上层的占了2/3，社会中下层子弟，不足1/3。

63、64、65年入学的学生，非常强调家庭成份，文革时，一般院校工农子弟已占2/3。情况也不尽相同，清华大学仍有30—40%学生出身“不好”，40%是职员知识分子子弟，20%以上是工农高干子弟（5）。文革初起，打“黑帮”呼声一片，对原教育路线的所谓“排斥工农子弟”形成反对声浪，是许多学生造反的因素之一。据说在北京院校中，电影学院工农子弟占30%，北师大25.5%，北工大17%，音乐学院10%，而北大物理研究班、电力热力6110班和北医大61、62班均无工农子弟（6）。总体上文化革命时，大学生的阶级出身，已与57年很不相同。出身普通工农、干部家庭的人，一度成为各派学生组织的骨干，知识分子子弟很活跃，但许多充当幕僚、笔杆子、串联人——“高级群众”的角色。其推波助澜作用不可低估。

毛曾经讲“派别是阶级的一翼”，文革中学生的分派，是有所体现的。

从学生领袖的出身粗看，北京院校多为革干、农民子弟，地方院校多为农民子弟，也有一些普通工人子弟。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就是苏北农家子弟，开始与他对立的学生组织领袖，都是高干子弟，但清华“井冈山”的活跃分子，既有干部子弟，也有知识分子子弟。武汉“钢二司”三个司令员，都是河南南阳人，二人系农家子弟。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有的是农民子弟，有的是普通干部子弟，有的本人是调干。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干部3人（包括原来的老院长副院长，大革命与抗日时期的干部），一般干部和教师4人，工人2人，21个学生委员中，12个是农民子弟，2名是革干子弟，4名工人子弟，3名城市职员子弟。30人中，有3人直系亲属曾被划为右派或有其他历史问题。

有家庭问题的人选进革命委员会，在当时一般不那么容易。不过，造反派讲成份，不一定唯成份。文革时期，大学红卫兵崇尚所谓路线斗争觉悟和表现，一些大城市的重点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尽管出身并不理想，也进入了红卫兵和后来革命委员会的核心。河南的大学大不一样，郑州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头头是清一色的工农子弟。河南农学院革委会25人，出身贫下中农的17人，中农的7人，官僚1人（系干部）。67届农学院毕业生398人，对388人出身统计结果是贫下中农、贫民小手工业家庭的190人，工人、普通干部7人，中农上中农职员145，地富40，小土地出租、小商人房产主6人。对67届的262人进行出身与文革表现统计，其中贫下中农、中农子弟参加造反的达176人、占了2/3以上（7）。中原地区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从一定角度看，似乎是一场平民革命，甚至是农民革命。文革群众政治观念的平民趋向是另一个应该研究的文化问题。

北京的运动受中央内部斗争直接制约、影响，某种意义上，地方的运动自发性强一些，暴露的社会问题明显些。从政治面貌看，1957年起来提意见的学生，被打成右派的学生，党团员似少些。当时党团员总数就少。可是1966年最先起来造反的学生，多是团员、党员。虽然，造反派学生的代表人物，不一定是党团员；特别是一些有反体制萌芽态异端思想或激进认识的人，更不一定是党团员。

北京大学颇具典型。反右前夕本科生中党员比例是15.3%，团员比例68.3%，当时的政治条件已属优秀。研究生、进修生的党员比重则高达28—30%。这一比例保持到61年夏天，61级新生入学后，本科生党员比例降到14.6%，62年秋是13.7%，63年是9.5%，66年批判“三家村”时，本科生的党员比例是6.9%。不过团员比例始终在62—72%之间摆动。北大统计学生右派分子是589人，占反右前夕学生的7.8%（8）。文革中相当多的

党团员参加了“新北大”和“井冈山”的活动，但骨干分子和激进分子仍是少数。

有人在香港对北京、广州的学生出身作调查，认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多数、部份成份‘高’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来自干部家庭学生的绝大多数，参加了保守派（9）。这个调查和分析如果在大学里有普遍性，将有助于弄清文革学生组织的思想倾向的社会结构属性。

从思想意识看，57年的学生只是从父兄处感知了一些政治运动，66年的学生，听说过反右，参加了大跃进，学习过反右倾，投入了意识形态的大辩论，参加过社教四清，已在中共历次运动中受到特定政治文化的影响。

57年的学生，只是这种文化系统形成中阶级斗争绝对化的第一批牺牲品。关键是50年代60年代的大学生，都有中国士人的普遍心态：“先天下之忧而忧”，“达则兼济天下”。与其说他们是一个创造的群体，毋宁说他们是忧患的一群。他们对延安整风以来的中共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怀着童稚之心，他们非常强调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国的作用，在运动中力图独立知识分子群体。

57年自发地出现了如“百花社”这样的群众结社，66年更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揭杆而起，旌旗缭乱，学生组织按共产党的思想、组织模式发展，已有了准政党的意识。知识分子企图在运动中实现独立人格，甚至在几年的挫折反复中拼命抗争。但谁都摆脱不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卷入潮流的多，自拔出漩涡的少。大学生都崇尚“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但他们跳不出中共如来佛的手掌心，他们不理解，现代史一再说：“五·四”是中共成立的思想准备，“一二·九”是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50—60年代的学生运动，也都是中共特定政治文化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思想革命运动。

60年代与57年不同的是，由于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被彻底僵化了。升学、入团、入党乃至评先进，部份学生均被排斥在外，出身不好的、甚至平民子弟和部份受排斥的普通工农子弟，都不免有一种压抑感，这在文革中得以表现与发泄。

工农子弟的压抑感，可能多来自于文化方面。文革的批判材料统计，对北京61所高校的调查，在贯彻“高教60条”前后，工农兵学生与工农子弟，竟有5千名留级，被赶出学校即劝退学生也有5千多人。其中清华大学波及到调干解放军2千多，北大800多，人大308人；商学院108人退学，其中工农子弟占94%，电院867名工农子弟，300人留级，80名退学。出身问题，不论在政治或是文化上，文革初都是能躁动人心的敏感问题（10）。同时，他们缺乏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对于工农当家之说，他们似是而非。

家庭出身问题，文革运动发动阶段特别敏感，是6—7月学生的一个争论焦点。以至有的学生居然登台骂自己是“狗崽子”，人格扭曲到难以置信。究竟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一部份人认为是以出身好坏、跟不跟党走划分，有红五类之说。对于当时的事实，迈斯纳强调“工作组也组织了‘造反’的学生组织，这些组织主要由享有特权的党的干部子女领导，他们支持学校党委，试图把文化大革命的攻击矛头从毛泽东主义的‘当权派’的目标转向‘资产阶级权威’和哪些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身上”（11）。另一部份人则抵制这一倾向，以是否紧跟毛主席为代表的路线，是否造各级党委的反来衡量真假革命。但后者一时不为社会传统认识承认，在对党委、工作组的态度上，他们成为少数派。不久，人们发现毛泽东是支持少数派的。文革初这种现象，自然引起中共上下以及大学生自己的猜度。66年8、9、10月关于出身论的分歧与争辩，盖出于传统的左派不让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投身运动。当时造反者自己，以及怀疑造反者动机的群众，纷纷向中央文革，向

周总理提问这一反常现象。陶铸还是中央文革顾问时，就与周恩来一起回答过群众的这些问题。他们承认文化革命前一部份人因出身或者一时表现，被僵化地看作落后分子，受歧视，不被重用，有的甚至被看作敌对分子，并在档案中放了材料。运动一来，他们的怨气对领导发了出来，对传统的所谓先进落后、革命不革命，对档案的作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实际上，面对群众运动一开始暴露出的纷争，善思考的知识分子内心业已明白，这些早已超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50天”的问题，特定的政治文化——从苏联学来的人事档案制度的某些弊端，特别是60年代初的阶级理论，走到极端，已造成社会上人与人的实际不平等、不公正，人格的扭曲。当时团中央临时书记王道义传达周总理在国务院部长会议的有关讲话，提及档案问题：运动一开始就排队，这是很错误的，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中央文革也作了回答，而且提出以是否赞成文革，是否造资反路线的反来划分左派右派。陈伯达说：“先进的变成落后，落后的变成先进……深刻地表现出来了”，认为制造“自来红”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弟的人”（12）。

陈伯达敢于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显然得到毛的支持。毛在10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洒脱地讲：“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批判“血统论”，一批受压制的学生登上文革舞台，但撰写“出身论”的遇罗克却付出了生命（他是当时在校学生的同龄人，因家庭问题进不了学院，却在社会大学里更强烈和系统的发出抗争）。同时，一批高级干部子弟，仅仅由于其父母成为“黑帮”，血统转化，受到新的压制和不公正的对待。

文革初的造反者这时得到了正名，他们不再是右派。这一阶级路线的重新解释，必然地引起老干部和高干子弟的不满。广大工农子弟不在乎，以前他们得到的不多，文化革命则给了他们更加光荣的地位。他们中众多的人进入造反学生队伍。56—57年，划分阶级属性还用传统的解放前三年的经济位置作标准。有了反右运动，有了划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全党全民开始习惯于用思想来判断普罗抑或布尔乔亚。批判资产阶级的武器第一次被民众——首先是被激进的大学生握取，矛头直指党的官员。在各级党委看来，造反大学生肯定是自由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恰是新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在毛支持的民众——特别是大学红卫兵看来，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官僚化的党内领导。从而全国全党甚至全军都批判资产阶级，演绎成一场悲喜剧，以至闹剧。57文化终于走到顶点和最后阶段，毛泽东概括为“全面内战”是恰如其分的。

文革初出现关于阶级出身的大辩论不是偶然的，这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一次挑战，是57政治文化动摇之始。从政治现象上看，一些领导利用传统的阶级论来组织队伍，稳住阵脚，抵制毛发动的运动，保护自己；另一部份人则要否定这种僵化的分析，通过参与运动实现自我的革命价值。这一辩论由于后来彻底否定文革被忽略，但是有的文革议论者却有意掩盖它在现代政治启蒙中的意义，他们批判这场辩论，可能其偏见多于无知。

（未完待续）

注 释：

（1）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p 482

（2）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p 29

（3）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朝华出版社，1993，p 526

（4）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p 149

— 186

(5) 晚年毛泽东, 春秋出版社, 1989, p286

(6) 教育革命专辑, 北京电影学院红卫兵编印, 1966

(7) 河南农学院1967届学生花名册, 1968

(8) 王学珍等, 北京大学纪事,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9) 罗德里克·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上海人民出版社, P164。引安妮达·陈, 中国社会结构面貌, 另见安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渤海湾出版公司, 1989

(10) 同(6)

(11) 莫·迈斯纳,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p418—419

(12) 陈伯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1966. 10. 16

∞ ∞ ∞ ∞ ∞ ∞ ∞ ∞ ∞ ∞

质疑“上海一月革命”

• 何 蜀 •

1967年1月21日晚上, 中国大陆上当时最为快捷、影响最大的官方传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在北京时间20点开始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黄金时段播出了将于次日发表的《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宣称: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 正以排山倒海之势, 雷霆万钧之力, 席卷全中国, 震动全世界。”

正如这篇社论所说: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在文革初期, 甚至在1966年8月狂暴的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 都还没有谁会预料到这样的局面。即使是“高瞻远瞩”的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 起初也未曾有过这样的“战略部署”。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 也只是在谈到“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时, 提出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而形势的发展, 已将这种由各级党委去自上而下地撤换“走资派”的“夺权”, 变成由造反派自下而上地向党政机关全面夺权了。

◇ 对一个习惯性提法的质疑

发生在1967年1月里的这场造反派夺权狂潮, 后来被称作“一月革命”, 并且往往被说成是“上海一月革命”、“由上海开端”、“从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例如: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67年1月6日”中记载: “上海造反派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 刮起‘一月革命’风暴。”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第三章第一节《“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中说: “由上海开端, 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紧跟而上的一市四省的夺权, 构成了1967年春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

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九章《从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中说: “1967年初, 在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它成了‘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新阶段的标志, 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 翻开历史一查, 在1967年1月的上海, 造反派并未完成对市级党政



机关的夺权，倒是其他一些地方完成了这个“壮举”。请看史实：

1月10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省级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

1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于元月12日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25日，《人民日报》刊登这个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1月16日，哈尔滨军工学院等23个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在哈军工学院集会。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夺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

1月17日，湖南长沙市造反派夺市委、市人委的权。

1月18日，全国财贸系统造反派举行“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新华社21日播发的报导以《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正题，突出暗示财贸系统已经夺权。

同日，聂元梓部署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连夜派出大批人员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各部夺权。

1月19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同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向全国出版系统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书（新华社21日全文播发），其中第一条就是“立即夺取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夺取每一个出版阵地”。《人民日报》22日转载时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表明出版系统已经夺权。

1月21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及广州市委、市人委的权。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

同日，徐州市两大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总部”和“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宣布接管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一切权力。

《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发表之后，中国大陆上进一步刮起了造反派夺权的风暴。

在社论发表的同日，青岛市造反派夺了原市委、市人委的权，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委员会。《人民日报》30日报导并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

同日，广西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组成“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宣布夺了自治区党政大权。24日，广西军区派出代表出席了造反派召开的“夺权祝捷再战誓师大会”。

同日，江苏省造反派宣布夺权（26日，造反派再次夺权）。

1月23日，河北造反派宣布夺省委、省人委及专员公署的权。

1月24日，南昌造反派宣布夺权。

1月24日至25日，重庆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夺了原市委、市人委的权。29日召开有驻军领导参加的誓师大会，决定成立以驻军代表为首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1月25日晚上，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夺了原省委、省人委及贵阳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大权（实际夺权时间比这要早，因为奉毛泽东指示向中央汇报夺权情况的贵阳地区造反派赴京小组已于24日乘专机当晚抵达北京〔1〕）。《人民日报》次日以《热烈欢呼贵州革命左派重掌大印》为题作了重点报导，新华社31日全文播发了贵州造反派的夺权通告和《人民日报》将于2月1日发表的社论《西南的春雷》。

1月27日，山东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宣布夺了原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委的权。2月3日，山东造反派与驻军指战员一起举行盛大集会，宣布“旧省委、旧省人委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死亡和新的临时权力机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人民日报》3月2日为此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同日，宁夏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夺权。

同日，北京市造反派宣布成立新的权力机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因种种原因，迟至4月20日才建立起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1月28日，中共沈阳市委被造反派夺权。

1月29日，青海造反派夺原省委、省人委大权。次日在《青海日报》刊登了《告全省人民书》。

1月31日，黑龙江省造反派经过10日夺权后的反复，在驻军支持下召开“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夺了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人民日报》2月2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同日，中共辽宁省委被造反派夺权。

2月5日，上海造反派和解放军驻沪部队全体指战员举行“热烈欢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我们把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彻底砸烂了！”……

仅从这个不完全的列举来看，在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的浪潮可以说是席卷了中国大陆各地。当时有些（如山西、青岛、贵州、山东、黑龙江）地方的夺权得到了中央承认，有些没有得到中央承认，但也大多得到当地驻军支持，即使只看中央承认的几个地方，上海的夺权也不是全国最早的，并非“上海开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紧跟而上”，上海其实是落在其他四省后面的；同时，上海完成夺权的时间也并非1月而是2月。

不仅夺权，就连夺权后建立“公社”这一作法，也不是上海的发明。1967年1月27日，聂元梓、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就举行了成立大会。当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回忆：“‘公社’不是上海发明的，首先是北京发明的。是陈伯达打电话给上海，通报北京准备成立公社了，要上海考虑成立公社。”〔2〕

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称文革中的夺权为“山西一月革命”或“山东一月革命”、“贵州一月革命”，却只称之为“上海一月革命”或“从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呢？为什么在夺权行动上落在不少省、市后面的上海反倒后来居上变成了夺权的样板呢？

◇ 上海在1967年1月就夺了市级党政大权吗？

上海在1967年1月确实有不少基层单位被造反派夺了权。但是，所谓某地夺权，应是指该地党政领导机关被造反派夺权。而在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是不是完成了向市级党政机关的夺权呢？

在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前，从1月15日到2月2日，确实发生过四次向原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有的还包括向驻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夺权的行动，但这些夺权均遭流产，因而不能说是已经“夺了权”。没有完成的行动自然也就不能算是“开端”和“样板”。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也说：“上海的夺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他造反派组织并不满意于工总司在张、姚支持下独掌大权的局面。因此，在1月6日打倒市委大会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其他组织曾经发动过四次全市性的夺权……”（3）

这四次夺权是：

第一次，1月15日凌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所谓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联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下属的第二兵团（即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简称“二兵团”）等造反组织，宣布夺权；

第二次，1月22日中午，上三司再次宣布夺权；

第三次，1月24日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宣布夺权；

第四次，2月2日，以二兵团为首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宣布夺权。

这四次夺权都因中央文革小组驻沪大员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和破坏而流产。

张、姚二人反对的并不是“夺权”本身，而是那些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没有事先请示他们，目无他们的领导（上三司竟然发布对张、姚二人的“任命”），或是有同他们支持的工总司、机联站（即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争权的意图，甚至（如第四次）是公开与他们唱对台戏，因而这四次夺权均被张、姚二人视为不利于他们篡党夺权的行动，领导这四次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上三司、红革会、二兵团等先后遭到分化瓦解和镇压。

也正因为这样，正当全国各地争相夺权的1月底，在上海却由夺权遭到破坏的红革会发难，掀起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的“逆流”。同时，二兵团又联合工三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工总司的反对派组成火线指挥部，与工总司爆发了“一·二九”南市斜桥武斗（因“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而中止）。上海此时在全国夺权交响曲中独奏出的是一阵不谐合音。

2月1日，张春桥、姚文元在镇压红革会之后接见上海各红卫兵组织代表时，姚文元说：“当前，上海广大革命造反派有两项首要任务：第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大联合，大夺权。这两项首要任务，都给红革会破坏了！”（4）这段话说明，张、姚也承认，直到2月1日，造反派在上海还并未完成大联合、大夺权这两项“首要任务”——就在他们这次讲话的第二天，又发生了同他们唱对台戏的二兵团领导的“大联委”夺权。若是造反派已经在1月份夺权，那么“大联委”岂不是在向造反派夺权了？

那么，能不能从另外的意义上说是上海造反派在1月份就“夺了权”呢？

◇ 上海造反派的“打倒市委大会”等于夺权吗？

一种常见说法是，上海造反派在1967年1月6日召开的“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就等于是夺了权。

张春桥在1967年2月24日上海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说：“1月6日的大会上就夺了权了。”〔5〕这种说法被沿用到现在，如《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上海“一月风暴”》条目中写到这次大会时就说：“大会发出通令，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随后，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组织联络站’，取代了市人委、公安局和市委，全面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67年1月6日”条目中记载：“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上海造反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然而，事实上上海造反派这时不但没有采取向市委、市人委夺权的行动，甚至根本就没有决定要“自下而上”地“全面夺权”。

有两个最有力的证据，(1)这次大会发出的《第三号通令》提出：“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2)在这次大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给中央文革小组写的情况简报中也作了这样的汇报：大会“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6〕

这足以反映当时上海造反派的意图：希望中央作出决定，像半年前对待原中共北京市委那样“彻底改组市委”，或是由中央下令“立刻军管”。不论是改组还是军管，都还是停留在5个月前公布的那个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十六条》的规定“框框”之内，即由上级党委向下级夺权。这与后来发生的由造反派“自下而上”进行的夺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7〕

在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谈到上海造反派的“打倒市委大会”时说：“这次大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的手里。因此，1月6日打倒市委的大会，是所谓‘一月革命’的真正标志。”如果说市委、市人委（或者省委、省人委）被迫停止办公，实际权力落到造反派手里就等于造反派夺了权，那么“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间就不应是1968年9月而可以算是1967年1月了。因为大陆许多大中城市都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间先后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中不少早于上海）。况且，即使原党政机关瘫痪了，但造反派尚未建立起相应级别的新的“临时权力机构”或“新生红色政权”，还不能以政权名义发号施令，这时也不能算是已经夺权。

◇ 上海造反派的两个文件等于夺权吗

另一种说法是，上海造反派1月5日发出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就意味着造反派向原市委和市人委夺了权，就是所谓“一月革命”。

当年1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将于次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三司）欢呼《紧急通告》发表的文章《面对革命的暴风雨坚

决地迎上去！——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致敬》，文章称上海造反派“造了上海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所把持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反，夺了他们的权。”这是第一次在官方传媒中将上海造反派“反经济主义”的行动提高为“夺了权”的说法，不过这里指的只是夺了对报社的领导权。在新华社同时播发、《人民日报》同日刊登的另一篇红卫兵文章，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这是一个彻底革命的文件》一文中，就只谈到“反经济主义”问题，没有提及“夺权”。

但是，在这之后的1月1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却又明确称毛泽东决定广播《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支持上海造反派“在一个市的范围内”夺权。这一说法沿用到了现在，如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月11日给上海造反派（祝贺他们发出《紧急通告》）的《贺电》“大大地提高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地位，扩大了这场夺权风暴的影响。”

上海造反派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不是可以等同于向市级党政机关夺了权呢？请看事实：

第一，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只字未提“夺权”——直到1月20日由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的上海造反派的另一个文件即《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才提到了夺权。在《紧急通告》发出的十条呼吁中，第十条是“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虽然口气是居高临下的“责令”，但却仍是要市委去“执行”，显然这并不是夺权而只是实行监督。

而且，这两个文件的中心内容根本不是讲的夺权，而是“抓革命促生产”和“反对经济主义”的问题。尽管两个文件中都把“破坏生产”和“刮经济主义妖风”等罪名强加在“走资派”头上，但这只是造反派“抢占政治制高点”的作法。事实上（当时的文革亲历者也都十分清楚），这两个问题都是造反派造成的。当时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和“反对经济主义妖风”，实质上是对造反派的批评和限制，并非向“走资派”夺权。

正因为如此，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事先都并不支持这两个文件。在《文汇报》准备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时，通过机联站向刚从北京回到上海的姚文元请示，姚文元十分冷淡，拒绝表态。王洪文参加了起草《告全市人民书》的会议，但他认为“是个阴谋”，中途退出了，签字时也找不到他，只好由工总司另外的负责人签字，签字者事后还遭到王洪文的指责。《紧急通告》起草时，王洪文拒绝出席会议，还指使一些人到会场大吵大闹，说反对经济主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大方向错了”。王洪文拒绝代表工总司在《紧急通告》上签字。1月8日下午各造反派组织通过《紧急通告》的会议曾邀请张、姚参加，但他二人不赞成批经济主义风，拒绝出席会议，《紧急通告》发表后，张、姚对机联站头头徐景贤等人大发脾气说：“5号刚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为什么又来一个通告？”吓得徐景贤等人把代表机联站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朱永嘉在内部批了一顿。如果说《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向“走资派”夺权，张、姚、王等人会是这种态度吗？

第二，《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不仅不是上海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结果，恰恰相反，倒是在“走资派”参与甚至可以说是“主持”下产生的。

当时因为上海工总司挑起武斗，导致所谓“保守派”的赤卫队一些人要上北京告状，工总司派出人马在昆山县桥镇追打、阻拦赤卫队人员，致使冲突扩大，沪宁铁路部份列车停驶。周恩来于1967年元旦凌晨打电话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尚未被造反派列为打倒对象的陈丕显，要他同群众组织协商，处理好“昆山事件”，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解决上海面临的严重问题，特别强调“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一定要搞好。”陈丕显当即叫秘书通知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到市委招待所开会，传达了周恩来指示，提议起草一个文件。这样才形成了《告全市人民书》。12个造反派组织负责人签字后，交给陈丕显，陈丕显签字同意，责成《文汇报》赶印29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8）。

如果说《告全市人民书》就是向“走资派”夺了权，“走资派”还能叫秘书通知造反派负责人来开会吗？造反派负责人又怎么可能去参加“走资派”召集的会议，并按“走资派”的提议写出文件，还要交给“走资派”签字付印呢？

《紧急通告》的形成过程也大体如此。陈丕显在会后打电话通知张春桥：“报上登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要表示支持。”他还说明：“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我和各个左派组织提出意见，我们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9）请看，“走资派”还在向造反派发号施令呢！

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和发表过程来看，哪有一点造反派向“走资派”夺了权的样子？

第三，从张春桥当时给上海造反派的“指示”来看，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前后造反派也并未进行后来才出现的那种“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

元旦凌晨，在陈丕显召集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开会前一小时，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机联站头头徐景贤，告诉他，周总理打电话给陈丕显，要陈解决铁路交通中断事宜，你们不要让陈抓到“辫子”，而要抓陈的“辫子”。又说：“曹荻秋不能出来了，现在要陈出来。陈丕显的帐，你们要清算，以后算。”（10）所谓“以后算”，也就是暂时不要打倒，当然更别说夺权了。

1月2日（即《告全市人民书》正在起草期间），工总司头头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等乘飞机到北京，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对策。3日夜，张、姚在《解放军报》社二楼接见王洪文等人，授意他们不要同陈丕显一起解决铁路交通运输和社会主义风问题，要他们等陈出来工作后，抓住陈的“辫子”，再把陈打倒（11）。张、姚4日回上海后，在一段时间里采取的也是让陈丕显出来工作，好在工作中抓到陈的“辫子”再把他打倒的方针。“让陈出来工作”，当然不是让陈丕显出来做打扫厕所一类的工作，而是让他出来继续领导市委工作，即是让他继续掌权。这显然不能说是造反派已经夺了权。

上海造反派两个文件发表后，1月12日，全市召开欢呼中央贺电的群众大会，张春桥、姚文元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到会上发表了讲话。张春桥在讲话中说：“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12）从张春桥加以宣传的、得到毛泽东欣赏的上海造反派这个口号来看，也还没有“全面夺权”的意思。上海的几个当权派受到的是区别对待，造反派对市委的第一把手陈丕显只是进行“火烧”，而在当时，“火烧”的含义很明确，就是只用群众性的批判把他“烧”一下而并不打倒。

第四，当时的舆论一般也未将上海造反派两个文件的发表等同于夺了市级党政机关的权。这方面报导很多，一般都只称这两个文件是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和“反对经济主义”。1月14日，新华社从上海播发了《文汇报》记者的长篇通讯《毛主席啊，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永远跟着您！》，文章综合报导了上海造反派两个文件及中央贺电发表后的上海局势，只字未提上海造反派已夺了市级党政机关大权，只在文中提到杨树浦发电厂、上海玻璃机械厂、上钢三厂平炉车间等几个基层单位的夺权。在提到上海铁路局夺权时说：“十一日晚，正在斗争极其尖锐的时候，从广播里传来了中央的贺电，在贺电的巨大力量的支持下，他们立即全部接管上海铁路局，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既然上海铁路局都是在中央贺电发表后才夺权，又怎么说得上在此之前就已经全面夺取了市级党政机关的大权呢？如果市一级的夺权已经完成，这篇上海造反派自吹自擂的通讯会不着重提及吗？同日上海《文汇报》社论《沉舟侧畔千帆过》中也明确写道：“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出了一个新事物：许多单位内的革命造反派起来夺了权。”“上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里写得十分明确，只是在“许多单位内”而并非向市级党政机关夺了权。

#### ◇ 上海两报夺权不等于夺市级党政机关的权

上海1月4日《文汇报》的夺权和1月5日《解放日报》的夺权倒是发生在1月里，而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被誉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由官方传媒作了公开宣传，对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报社的夺权说成是“上海一月夺权”呢？

显然不能。因为夺报社的权，与夺地方党政机关的权不是一回事。

文革伊始，各地报社首当其冲，最早是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际上夺了《人民日报》的权。各地党委纷纷都效法北京在报社里揪“小三家村”、“小邓拓”，部署报社夺权，几乎是全国无一例外。不过那都是由中央或各地党委决定，“自上而下”的。由造反派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夺权是从1966年12月开始出现的。仅举几例：

1966年12月14日，昆明造反派红卫兵强行封闭《云南日报》。

12月17日，《四川日报》被红卫兵、造反派宣布“封闭”，进驻报社的造反派“勒令”原编委会成员检查认罪，“随叫随到”，实际等于夺了权。

12月27日，成都造反派查封《成都晚报》，改出《红色新闻》。

12月30日，陕西造反派查封《西安晚报》、《陕西农民报》。

12月31日，全国总工会系统造反派等查封《工人日报》。

同日，《重庆日报》被造反派夺权。自1967年元旦起改出《新闻报导》，由“重庆日报革命职工编印”（次年1月7日改由“重庆日报红色造反者主编”）……

由此可见，在各地报社的夺权中，上海也并非“开端”。

#### ◇ 上海是怎样后来居上变成夺权样板的

既然在整个1月份上海造反派并未完成对市级党政机关的夺权，策划夺权的张春桥、姚文元反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已完成夺权的时候遭到声势逼人的“炮打”，那为什么后来上海却被当作所谓“一月革命”的发祥地和夺权的样板呢？

究其根源，还是出自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父，就吃混毛猪。”〔13〕这个讲话以夸张的语调把上海《文汇报》的夺权提到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的高度。当时这段讲话虽然没有由官方公布，但却被造反派传出来，其主要内容也被写进了《人民日报》次日转载上海造反派《告全市人民书》时所发的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中。只是其中还没有出现“夺权”的字样。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为祝贺上海造反派发出《紧急通告》给他们发去《贺电》，其中吹嘘上海造反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说法等于是认定他们已在全市夺了权，但仍然没有使用“夺权”字样。

1月15日下午，北京及外地造反派150多个组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即欢呼中央给上海造反派贺电的大会。陈伯达和周恩来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主题都是号召各地造反派向上海造反派学习，反对经济主义，搞好“抓革命促生产”，实行大联合。他们不仅只字未提“夺权”，反而一致强调了反对“接管风”。此时所谓“接管”，实际上就是夺权的另一种说法（后来才统称为夺权）。陈伯达明确指责说，接管风是走资派的“新花样”，让造反派接管，他们跑到台后，让我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得不好，他们看笑话。他提出，除个别地点、机关外，应该大量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强调了不要形成接管风〔14〕。

但是，当天大会后即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王力回忆：“工人体育场开10万人大会，陈伯达讲话，一是夸上海，二是说自下而上‘夺权’的口号不对。只能监督，不能夺权。还说‘上海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会一开完，主席就知道了，马上召开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主席讲了一大篇道理，主要内容都在《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中。”〔15〕文革中陈伯达向群众发表讲话时，因其地方口音群众难懂，通常都由王力进行“翻译”。但王力仅凭记忆将陈伯达批评“接管风”的讲话错记成了批评上海夺权。陈伯达当时显然不可能那样说（否则当时就会遭到“炮轰”甚至被打倒）。不过王力关于毛泽东在那次大会后马上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夺权讲了一大篇道理的记忆，应是可信的。

这次会后，王力、关锋按照毛泽东意图起草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二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经毛泽东审定，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人民日报》次日发表）。文章称“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并称上海“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这是第一次公开称上海造反派已经“夺了



权”并将其树为“样板”的官方说法。

1月19日，张春桥一伙在拼凑夺权班子的会议上狂妄地把他们的夺权与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相比，说可以叫作“一月革命”，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组织可以叫作“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可以定题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16）……但这些说法当时尚未在官方传媒中公开。

1月21日，新华社播发“全国第一个联合起来的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于18日举行10万人的“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的消息（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以《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正题，突出了夺权这一主题。这次大会通过的《向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写进了“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学习”。但在新华社同时播发和《人民日报》同日刊登的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的紧急呼吁书《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取出版大权，担负起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政治任务》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中，都未提“向上海造反派学习”的话。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两篇报导同时广播和发表的，对号召全国造反派夺权起了重大作用的《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却颇为引人注目地只字未提上海夺权！——须知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定的。距他上次审定那篇《红旗》评论员文章只过了一周，就从称上海已经夺权并视其为样板的说法变成了只字不提上海。是不是此时上海的夺权反复已经被毛泽东得知？未见有关记载，只能存疑。

又过了9天，在1月31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2月3日出版）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却又一次肯定上海造反派已经夺权，并且第一次由官方传媒公开了“一月革命”这个提法。这篇社论说，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一月革命”的桂冠正式戴到了上海造反派头上。

1967年10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上海革命人民和驻沪三军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发表讲话（次日《人民日报》刊载），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历程时说：“1967年1月初，毛主席又亲自点燃了上海‘一月革命’的熊熊烈火”，还说“‘一月革命’风暴首先在上海掀起”。

1969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全会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央《政治报告》中说：“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上海一月革命”从此即“载入史册”，成为样板。“上海最先夺权”、“从上海刮起一月夺权风暴”的说法也就众口铄金地变成了有关文革史的“常识”。

◇ 为什么毛泽东要将上海树为“一月革命”样板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把在上海夺权之前就已发生、真正在1967年1月完成了夺权并得到中央肯定的其他几个省市树为样板，却把落在后面、在2月里才完成夺权的上海树为“一月革命”的样板呢？

是那些地方的夺权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不像上海紧密吗？其实，那些地方的夺权无不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授意和支持下进行的。山西夺权，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被江青召到北京，派关锋同他谈话，叫他回去夺权的；贵州夺权，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得到中央文革小组赏识，被召到北京，江青亲自叫他回去夺权的；青岛和山东的夺权，是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通过康生之子张子石，了解到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夺权的精神，组织夺权的；黑龙江夺权，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得到与中央文革小组关系密切的红卫兵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就是该组织骨干成员）的支持而进行的。

是那些地方的夺权没有实现“大联合”或“三结合”吗？也不对。从几篇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可见中央对他们的肯定，他们进入“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有的是中央委员，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档次”比上海高，影响应该更大。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上海真正实现了由工人阶级控制局面。所谓工人阶级控制局面，其实只是指以王洪文为首的上工总司控制了局面。是因为这个原因上海才得到毛泽东赏识而被树为样板的吗？

也不对。可以比较一下最早夺权的山西：进行夺权的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是以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为主干组成的，其总指挥是第十三冶金公司电焊工杨承效。若要讲工人身份，杨承效比王洪文的“牌子”还硬：王洪文只是工厂的基层干部，而杨承效则是“响当当硬梆梆”的第一线工人。此外，公开站出来支持山西造反派夺权的，还有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李顺达和解悦〔17〕。同时，陈永贵还是毛泽东树立的农业方面的样板大寨大队的领头人。请看，山西的夺权不仅是“工人阶级控制局面”，而且是工农联合控制局面。不论是按毛泽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还是“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观点，都完全应该将山西树为夺权的样板才对。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却偏要将上海树为夺权的样板呢？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为了借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力量推行他的文革路线而对他们加以扶持的一个作法，给他们的一个“赏赐”。

尽管上海造反派夺权较晚，但文革之火是从上海点燃的，是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伙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在上海密谋炮制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为发动文革立下了“头功”。而且，对毛泽东来说，在理解、阐发和贯彻他的文革意图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方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无疑是要比山西等地领导夺权的那些风云人物更为有用。

毛泽东将上海树为文革夺权样板，将“一月革命”的“桂冠”奉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的作法，为后来“四人帮”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曾多次严厉批评“四人帮”，但他恐怕至死也未能明白，正是他的文革理论和树立“一月革命”样板之类作法，促成了“四人帮”这种恶瘤的迅速生长。

注 释：

〔1〕《贵阳地区革命造反派赴京小组汇报提纲》，1967年2月

- (2) 王力“‘文革’第一年”，《传记文学》1995年第五期  
(3)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33页  
(4) 叶永烈《张春桥传》，作家出版社，第195页，  
(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6) 范文贤“无法无天的上海滩——所谓‘一月革命’始末”，《上海法制报》  
1986年6月30日  
(7)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01页  
(8)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198—199页  
(9)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200页  
(10) 范文贤“无法无天的上海滩——所谓‘一月革命’始末”，《上海法制报》  
1986年6月23日  
(11) 同(10)  
(12) 叶永烈《张春桥传》，第184页  
(1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75页  
(14)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7年1月17日第11期  
(15) 同(2)  
(16)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208页  
(17) 《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花城出版社，第103—106页

~~~~~  
【不堪回首】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血统论、红色恐怖、噩耗

• 遇罗文 •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我家》一书。作者遇罗文在文革初期，为宣传其胞兄遇罗克写的《出身论》而创办《中学文革报》。因遇罗克案两次株连入狱，被关押6年。】

◇ “血统论”不再遮遮掩掩

早期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其中也有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和它同时组织的，还有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以后各校纷纷组织了这种组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参加，有的也允许一部份工农子女参加，对这种早期的“红卫兵”，人称“老红卫兵”。

他们最大的怨气，就是嫌像《中国青年》杂志这样的宣传机构和一般的学校领导、教育部门以至整个社会，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狠，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太温和了，而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就是专政对象。而北大的孔繁大喊陆平优待了“狗崽子”，从此开了先声。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导，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演出了。

他们信仰的是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所做的社会各阶级分析是，敌人——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他们的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也在其内。自己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至于出身介于黑七类与红五类之间的，是可以团结但不可以依赖的对象。如果本人是工人或小干部，无论多么年轻或是不是党员，父母是“敌人”的一律划归“黑七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

凡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血统论”这个幽灵，曾在神州大地游荡。它像霉菌、病毒，既作恶多端又无孔不入。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出身不好的，不仅升学、招工、提干、当兵、学开汽车、接触精密设备等好事难于问津，甚至发生过与家人一起无辜受刑的事。

我的哥哥，从小就有一股反抗强权的精神，视“同情弱者”、“打抱不平”、“侠胆相照”为无上美德。所以在1966年8月，“红色恐怖”盛行之时，哥哥有感于“血统论”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写成了《出身论》。

作为一介书生，惟一的武器就是纸和笔，至于能不能发表，恐怕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只是拿给我们大家看。

#### ◇ 开始了“红色恐怖”——人类的丑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八一八”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不但中学有了这种组织，就连大学、工厂、机关、农村也都组织起来。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

“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就亲眼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见《“臭妖婆”自述》，原载《百花洲》1989年第5期）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老人的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街上走着，就碰上了这种景象：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见《树与林同在》1999年3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8月23日，北京市崇文区揽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房产主”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把“房产主”全家活活打死。

就在这人类的丑闻接连不断，“红卫兵”暴行节节上升之时，9月15日，林彪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谁家“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谁家该“抄”，名单由派出所、街道、居委会提供。谢富治在1966年8月下旬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次会议上就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街上有巡逻的解放军，打死“阶级敌人”他们不管，“黑五类”想反抗，有“阶级报复”举动，他们坚决维护“革命小将”的安全。

更令人发指的是，北京六中、一中成立的骇人听闻的“劳改队”。那里专门关押出身“黑七类”的无辜学生，每天他们都被施以惨绝人寰的肉刑。罗克知道这些事后万分气愤，把它写进了两篇文章，登在《中学文革报》第二期上予以揭露。

这两个学校只不过是个典型。没有打死人的学校是少数。宋要武所在的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竟逼着她们的校长当着她们的面去上吊。社会上各个角落毫无人性地残害“阶级敌人”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

北京吉祥剧院，成了当时最大的施虐集中营。凡是各学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到那里。到了那儿，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每天都用卡车往火葬场送死人。

哥哥厂里的一个同事，一个非常能说的青年，到我家讲了那里的恐怖。他说，要不是为了搭救他弟弟，要了命也不敢进那个魔窟。幸亏他嘴皮子利索，跟“红卫兵”们攀起了“阶级兄弟”，终于让他们相信他五代以上都是“红五类”，他的弟弟因此“本质”是好的，是一场误会。他弟弟被释放了。据他说，如果晚一步，人就被打死了。

哥哥每次听到这些人类的丑闻，心情总是非常沉痛。他说：“应该把这些事都记下来。编个集子，留给后人看看，知道现在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与此同时，“老红卫兵”们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贴到学校、工厂、机关、农村以及社会上每个角落。他们在北京展览馆、音乐堂、天桥剧场等有舞台的地方，用一个接一个的“他妈的”这种最“革命”的语言，用口号声夹带着鞭炮这种“革命的火药味”，来进行宣传，并煞有介事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黑七类”子女如何欺侮他们，旧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包庇、优待“黑七类”子女，“红五类”子女如何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等等。

会场上除了谩骂、口号以外，毫无道理可言。绝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斗胆上台辩论两句，马上会被打下台去。这也难怪，新市委书记也承认：“对联的精神是好的，只不过提法不当。”而且大讲特讲干部子弟的优越性。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作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

社会上早已畸形发展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变本加厉地被抬成头等重大的事情。家庭出身成了衡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到有的学校去参观，要登记什么出身；在辩论会上发言，也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病历上也有“家庭出身”一项。

出身，在“文革”中像幽灵一样在中国大地游荡；所谓不好的出身，像枷锁，禁锢着亿万青年的手脚，使他们从生下来就饱尝着人间的不平等。没有前途，没有

幸福，没有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尽管有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依然难免祸从天降，甚至死于非命！罗克深感自己有责任为捍卫人类的尊严去纠正愚昧的偏见，揭穿阴险的诡计，哪怕献出自己的一切。

# ◇ 噩耗

我们照例只买张站台票就上了火车，这种“特快车”在郑州以前不会查票。

我和弟弟陪着姐姐直到邢台，看着她随人流走出了站台，才放心地又回到车厢，继续我们的旅行。没有了她，我们轻松了许多——我俩是知青身份，遇上查票的告诉他们：“知青，没钱。”就能放我们过去。姐姐当然也可以冒充知青，万一露了馅儿，那可不是好玩儿的。

回到陕北，弟弟又在我所在的小队住下。

几天以后，他和不少社员都很熟了，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于是我们趁队委们在大队书记家开会的机会，向大队书记申请调动的事。

书记征求小队干部的意见，还没等他们说话，书记十几岁的儿子说：“我看这娃老实，人不错。”

别人见他说开了头，也纷纷夸弟弟，表示同意他调过来。当即书记在我们写好的介绍信上盖上名章。我们到公社再换成正式的介绍信。

经过努力，终于把弟弟调到我所在的生产队。从开始下乡到现在，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实现了和弟弟一起生活的愿望。

姐姐回到教养所不久，她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教养所人满为患，忽然动员教养期满的人离开教养所，能回家的尽量回家，大城市来的无法回去，给安家费分配到附近农村。美中不足的是，所去的农村实在太穷，每天份值几分到一毛几。

不管怎么说，离开专政机关比什么都强。姐姐此时有如飞出牢笼的小鸟，自然又有一番心境。她被分到河北临西县，一到那里就给我们寄去一首诗《雨后的云》：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羡慕那群云呵，疾速地奔向远方……  
你撒下甘醇的水，使大地滋润、生长；  
你投下瓢泼的暴雨，锻炼人意志更强；  
你亮出利剑的光闪，像复仇的火焰一样；  
你发出震耳的轰雷，激烈地呼鸣唤响……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想变做那云，疾速地飞向远方……

除了诗，她还邮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件白汗衫。那是用她的生活费买的当地的土布，经她自己裁剪、蹬缝纫机制作的。衣服哪儿都好，只是太瘦，肩膀窄了将近两寸，我们无法穿。如果硬穿，扣子系不上，胳膊也抬不起来。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瘦弱的样子给她的印象太深，没想着把衣服做肥大一点儿的缘故吧。

1970年3月，在陕北，我们接到父亲的来信，得知哥哥牺牲的噩耗。

那天中午我们兴冲冲地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来信，回到窑洞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却是我们最怕知道的消息。

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抒发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

我和弟弟失声恸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敬爱的哥哥。

我一次又一次透过泪眼去看父亲的信，希望自己看错了字，不是“霞走了”而是“霞没走”……不久前不是有过一次么，“讨论”的20个人处死了19个，留下了哥哥，我们还高兴了一阵子……这次不能又出现奇迹么？

哥哥对我们的关心、对朋友的真诚、对长辈的孝敬，他的刚直不阿、他的诙谐幽默、他的克己助人、他的敏而好学、他的无私无畏、他的简朴、大方、执著、豁达、博文、强记、乐观、向上……他的一切音容笑貌，一篇篇一幕幕都呈现在我眼前。我追忆着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眼神，捕捉与他有关的每个细节……

天，早已经全黑了，我们也早已由哭到抽泣到默默地流泪，全然不知道已是什么时候。我对弟弟说：“咱们永远不要忘记哥哥，不要忘记这件事！”我听见他哽咽着坚决地答应了一声，感到极大的安慰。

我忽然想，我俩、父亲母亲互相还有个安慰，姐姐呢，谁能安慰她！

□ 摘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叶森树（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 边（芬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 青（加拿大）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国）	<cnd-cm@cnd.org>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ftp.cnd.org\[206.135.33.5\]: pub/hxwz](ftp://cnd.org/206.135.33.5/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 pub/cnd/](ftp://cnd.org/142.132.1.13/pub/cnd/)

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